

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with 动态非相容性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拓展

刘金全 刘志强

摘要: 本文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全面分析,在基本假设和模型结构上进行了拓展,特别是定量地分析了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中的政策有效性和动态非相容性问题,并给出了政策动态相容性的基本条件,论述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对制定当前经济政策具有的启示。

关键词: 政治经济周期 政策有效性 政策动态相容性

一、引言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从各种经济冲击角度研究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理论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周期理论再一次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各种经济冲击的生成机制、反应机制和传导机制,描述经济冲击在传导过程中累积放大或者分解消除的过程。根据经济的市场和个体特征,可以将现代经济周期模型分为三个特点比较鲜明的理论分支,一是均衡经济周期模型(EBC模型),二是非均衡经济周期模型(DEBC模型),三是政治经济周期模型(PBC模型)。

EBC模型主要包括货币经济周期模型(MBC模型)和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EBC模型假设经济具有完全竞争市场和理性行为个体,坚持市场出清、古典两分和政策中性等瓦尔拉斯经济特征。MBC模型认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名义冲击(主要是外生货币冲击)作用,其传导机制是信息的非对称性和由此引发的信息障碍、调整障碍和名义粘性。RBC模型强调实际经济冲击(主要是内生生产率冲击)作用,通过资本时间累积和要素中介替代等传导机制形成经济波动。DEBC模型主要出现在非均衡学派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当中,主要研究累积需求冲击传导过程中的非对称调整、市场不完全性、经济个体的市场效力和调整成本等问题。在上述经济周期理论当中,经济冲击的发生和传导均被限制在固定的市场模式和制度模式之下,主要分析具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协同变化和相互影响,很少涉及作用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的政治冲击,也很少涉及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对策时形成的经济政策冲击。

政治冲击和政策冲击是影响经济运行和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为了研究政治冲击和政策冲击作用机制,人们根据一些经济中存在的竞选周期和执政政党的更换周期等现象,提出并开始研究 PBC 模型和理论。PBC 模型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十分流行,并以 Nordhaus (1975) 的研究成果作为标志完善起来,成为当时分析经济政策有效性和对策性的重要理论工具。PBC 理论的发展在其后新古典综合和理性预期革命期间缓慢下来,随着目前国际上政治冲击增多,国家对经济干预增强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宏观经济动

态和对策研究方法的进展,进入 90 年代以后 PBC 理论又开始加速发展并得到宏观经济学界的重视。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市场化进程当中,经济运行当中政治因素和经济政策冲击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现有的 PBC 模型及理论对于制定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将在推广的框架下研究 PBC 模型。本文第二部分主要论述 PBC 模型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理论主旨,对于 PBC 模型的基本假设进行描述和分析;在第三部分当中介绍 PBC 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定量刻画 PBC 模型当中政策工具变量同目标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第四部分当中通过求解动态约束条件下 PBC 模型的周期解,分析 PBC 模型当中存在的经济政策动态非相容问题,这是本文对于 PBC 模型的拓展;最后在第五部分当中借鉴 PBC 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

二、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在分析市场和经济个体行为时,主要以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为标准,寻求经济可能存在的长期稳态均衡。由于经济个体十分关心经济现实和社会福利,竞选者更为关心政治权力,因此在一些重要决策问题上无法忽略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政策倾向之间的关联和交互作用。PBC 理论主要研究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特别是出现政治冲击时,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反应和最优调整方式。由于选民的选举决策依赖现实经济状况,因此经济现实和政策选择具有内在相依赖性。PBC 理论将各种政治因素内生化为在经济模型当中,属于内生经济冲击和经济周期理论范畴。

PBC 理论假设政府和其他政策影响或操纵者具有周期性的非经济目标,最为典型的是寻求在周期性的总统或者执政选举中获胜。因此,为实现周期性的非经济目标导致的周期性政策冲击,导致了 PBC 的出现。一般 PBC 理论主要涉及到下面几个基本问题。

1. 选民的经济行为

投票是社会个体参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的普遍方式,因此何种因素影响和决定选民行为,选民行为具有哪些基本特征,选民行为是否理性(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选民是否能够获得决策所需的广泛信息,选民对竞选者的评价是依

据过去业绩,还是依据预期表现等,均是 PBC 理论从选民角度应该分析的基本问题。

选民是 PBC 理论分析的微观行为和对策主体之一,可以将其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如果选民对经济政策和政府行为具有理性预期、能够获得评价竞选者的完全信息,则称其是理性的,否则称其是非理性的。对待理性选民,竞选者为了获选采取的即时性“欺骗”行为,或者采用相机选择的非动态相容政策,不仅不能达到预期获选目的和提高社会福利状况,而且有可能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出现非效率损失。

2. 竞选者(政党或团体)的经济行为

在竞选过程中同选民进行对策的另一个角色便是参选的政党、团体或者个人。这时参加竞选争取连任的执政政党(称之为政府)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因为他们具有制定、执行和修改经济政策的权力和机会。

竞选者是 PBC 理论分析的另一个微观行为主体。如果参选政体在竞选中唯一目标是竞选获胜,为极大化所获选票比例而采取迎合选民的经济政策,那么称其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如果参选政体主要为了实现某种经济或者社会目标,并不仅为获取权力和声誉,则称其是理想主义的(ideologica)。也有一些政体是机会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体,即在选举前体现出机会主义行为,而当选后则体现出理想主义行为。竞选政体在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的交替选择,是诱发经济非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是政体对待选举的两种基本方式。现实中政体究竟以何种方式对待选举,并且在选举中采取哪些有利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时是否有效,政策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具有约束和偏好(例如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对待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具有不同的倾向),竞选者之间是否形成竞争等,均是 PBC 理论从竞选者角度出发需要分析的重要问题。

3. 经济结构和竞选对策

描述和划分经济结构类型,需要说明经济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方式,需要说明经济政策的作用渠道,需要说明选举过程中选民或竞选者影响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经济结构同经济政策是否有效、政策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以及行为主体(总统、议会和中央银行)控制和操纵政策工具的能力有关。经济结构是 PBC 理论中选民和竞选者进行对策和实施对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分析竞选对策,需要判断各种参选政体在竞选中是竞争还是合作的。如果竞选是竞争的,那么需要分析竞争下的选举结果对于社会福利状态而言是否有效;如果竞选是合作的,那么需要分析选举过程中如何协作和获选利益如何划分。在竞选者和选民的各种对策过程中,还需要了解经济的信息结构,需要判断信息结构相对于对策是否完全,需要了解在哪些利益和诱惑驱使下,参选政体和选民会出现非理性的政策和选举行为。上述诸多问题均是 PBC 理论在进行对策分析时应该予以解决的。

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

如果假设经济具有完备的竞争市场体系,并且结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动态行为模型(产出行为、货币供给和投资

行为模型等),可以通过采用比较完整的模型体系来正规化地论证 PBC 的形成过程。PBC 理论中的政策工具变量仍然以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利率、汇率及价格水平等)和财政政策(税率和转移支出等)为主,这同其他经济周期理论并无实质差别,只是在分析过程当中更加注重通胀率、失业率和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主要的 PBC 模型有以下两种。

1. 选票极大化模型

选票极大化模型也称为机会主义周期模型。这时假设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获得最大比例的选票,因此要求政府不仅知道选民的选举函数(选民投票的效用或者收益函数),而且还具有灵敏的政策工具变量。

假设政体的偏好函数是: $W=F[u(y), P]$, 这里 W 表示政体的偏好, y 是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它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y=f(u, \dots)$, u 是失业率, \dots 是通货膨胀率或者预期), $U(y)$ 是产出的社会效用, P 是该政体当选的概率。政府偏好中既含有理想主义成分,也含有机会主义成分。如果政体仅注重获选概率 P , 则政体是机会主义的;如果政体仅注重社会效用 U , 则是理想主义的。

在极大化选票模型中,政府的政策选择被限制在扩展菲力普斯曲线上,政府根据选民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的相对厌恶程度,利用政策极大化偏好函数: $W=F[U(u, \dots), P]$, 这将导致选举前后产出、就业和价格水平等变量的波动行为。实证分析(Mueller, 1970)表明,美国某些时期确实存在为了竞选获胜而采取的对策性政策。

2. 党派周期模型

党派周期模型也称为理想主义周期模型。如果执政政体是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混合的,那么会综合考虑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如果仅存在两个政体(可以假设为自由党 L 和保守党 C),他们的政策偏好函数为:

$$W_i = -[u_i^2 + b_i^2 + (1 + \mu)^{-1} (u_{i-1}^2 + b_{i-1}^2)], i=L, C$$

两个政体具有相同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时间贴现率,只是对通胀的厌恶程度不同,保守党要比自由党高一些,即: $b_L < b_m < b_C$, b_m 是中性感选民(对政体没有特殊偏好)对通胀的厌恶程度,这里的参数体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折衷。如果政体是纯现实的,那么为了迎合中性选民,会取 $b = b_m$ 。如果政体是纯理想的,那么为了迎合中性选民,会尽力选取中性选民最偏好的参数取值。这时选民知道各个政体之间的差别,他们会将选票投给与他们偏好最为接近的政体。

政体需要考虑选民群体之间的差异,这是影响 PBC 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选民阶层对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和反应程度可能不同。例如富裕阶层可能对就业政策的反应不如对价格政策敏感,而低收入阶层可能更喜欢低失业率和相对适中的通胀率。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执政党均有诱发经济周期的动机,当政府相信能够在下一届选举中会获胜的时候,则竞选约束和目标是松弛的,这时政府行为仍然具有连续性和规则性,这时并没有 PBC 产生。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可能获得低于当选选票的时候,竞选约束才是紧迫的,这时政府才会操纵经济政策,从而形成 PBC。这说明 PBC 一般没有规则的形状,在经济和政治稳定性较强的经济中体现得并不明显。

四、政策有效性和动态非相容性

导致 PBC 出现的经济政策取向,同计划者经济的政策稳定性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PBC 理论一般没有对社会福利状态给予关注,即使存在“社会福利”的政策衡量标准,现实中也没有追求“社会福利”最优的行为个体。在 PBC 出现时,传统福利经济学无法解释 PBC 中的实际经济行为,这时需要新的政策目标和评价方式。

1. 选民的评价函数和 PBC 模型的周期解

选民对政府评价的主要因素有:通胀率、失业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税收负担以及政府的转移支出等,这些指标选民能够容易得到并提取信息。假设选民的评价函数 v_t (选民的投票率,政府的得票率)仅依赖收入和通胀水平,即: $v_t = - (p_t)^2/2 + y_t$, p_t 是价格水平, p_t 是通胀率。假设选举为两个阶段,则政府的累积得票率 V_t 为: $V_t = v_t + v_{t-1}$ 。这时一个完整的 PBC 模型为:

$$y_t = [p_t - E_{t-1}(p_t)], E_{t-1}(p_t) = p_{t-1},$$

$$V_t = v_t + v_{t-1}, v_t = - (p_t)^2/2 + y_t$$

其中充分就业情形下的收入水平可以正则化为零,则 y_t 便是产出的均衡偏离。模型中的第一个方程是卢卡斯供给曲线,预期方式是典型的适应性预期,选民对政府评价具有后顾性,通胀率 p_t 是政府可以影响的政策工具变量。

选民是否将经济状况作为评价政府表现的标准,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Stilger (1973) 认为,如果选民是理性的,那么在非集权经济中选举结果和当期经济现状可能没有关系,因为理性预期下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说明政府在改变经济现状上无能为力,选民不会将现实经济状态的优劣归因于政府行为,也不会为政府竞选政策的诱惑所动,从而无法对政府政策给予特殊的倚重和偏好。

将即时得票率、预期形式和产出方程带入到累积得票率函数中,可以得到:

$$V_t = - \frac{1}{2} (p_t)^2 + p_t - \frac{1}{2} (p_{t-1})^2 - (1 - \beta) p_{t-1} - p_{t-2}$$

假设 $t=E$ 表示选举期,则 $t-1$ 是非选举期,记为 $t-1=N$,则 $t-2=E$,因此有:

$$V_E = - \frac{1}{2} (p_E)^2 + (1 - \beta) p_E - \frac{1}{2} (p_N)^2 - (1 - \beta) p_N$$

极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frac{\partial V_E}{\partial p_E} = -p_E + (1 - \beta) = 0, \frac{\partial V_E}{\partial p_N} = -p_N - (1 - \beta) = 0$$

这时机会主义政体对政策的最优操纵是:

$$p_E = (1 - \beta) > 0, p_N = - (1 - \beta) < 0$$

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选举之前,政府降低失业率,导致通胀和通胀预期提高,将菲力普斯曲线向外移动;当选之后,立即增加失业率以降低通胀和通胀预期,将菲力普斯曲线向原点移动。由此可见,PBC 的起源是政府精心策划的一种非稳定政策,对政府而言它要比实行凯恩斯提倡的稳定性政策更为有利。

经济在选举和非选举期间的均衡产出水平为:

$$y_E = 2 \frac{1 - \beta}{1 - \beta} > 0, y_N = - \frac{1 - \beta}{1 - \beta} < 0$$

由于在选举期失业下降,价格上升,使得产出高于充分就业水平;在非选举期失业上升,价格下降,使得产出低于充分就业水平。随着选举阶段的交替和政府通胀政策的变换,便形成了产出的选举周期。

2. 理性选民假设下的政策非相容性

经济政策非相容性是指初期制定的整个时间路径上的最优经济政策,当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以后将不再是后续时间路径上的最优政策,政策制定者具有改变初始政策的诱惑和动机。因此,为了保证初始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制定经济政策需要满足一定相容性约束。较早的经济政策非相容性出现在政府的税收问题中 (KydlanandPrescott,1977),我们发现在 PBC 模型当中也将出现政府修改前期最优政策的非相容性,这是进行多阶段对策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当选民具有理性预期 $E_{t-1}(p_t) = p_{t-1}$ 时,产出总维持在自然率水平上。这时极大化投票率的政策选择是: $p_E = p_N = 0$ 。但如果政府认为选民形成这样的理性预期后,那么可以利用政策“欺骗”选民,有进一步提高得票率的可能。这时政府可以假设选民预期满足: $E_N(p_E) = E_E(p_N) = 0$,则有:

$$V_E = - \frac{1}{2} (p_E)^2 + p_E - \frac{1}{2} (p_N)^2 + p_N$$

从而极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frac{\partial V_E}{\partial p_E} = -p_E + 1 = 0, \frac{\partial V_E}{\partial p_N} = -p_N + 1 = 0$$

这时政府倾向于采用通胀政策: $p_E = p_N = 1$,出现了政府的通货膨胀癖好,它能够提高政府的得票率。如果假设选民具有前瞻性,即: $V_t = v_t + E_t(v_{t+1})$,则可以采用 Barro-Gordon (1983) 形式的 PBC 模型为:

$$y_t = [p_t - E_{t-1}(p_t)], V_t = v_t + E_t(v_{t+1}), v_t = - \frac{1}{2} (p_t)^2 + y_t$$

如果政府公布的通胀政策为: $p_E = p_N = p_a$,在执行时政府出现反悔,并且改变政策的诱惑是:

$$T(p_a) = V(p_E = p_a, p_N = p_a) - V(p_E = p_a, p_N = p_a)$$

极大化上述反悔收益,可以得到它的极小值为: $T(\cdot) = 0$,即只有初期公布 $p_a = 1$ 才是可信的,其他选择均具有可以进行反悔的余地。上述 PBC 中存在的通胀癖好,说明政府具有选择通货膨胀政策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选民更为注重就业和收入增加。

五、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的拓展和启示

在一些经济当中,选民实际上无法对具有竞争性的政体、偏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状态进行选择,因此选举结果无法体现政府声誉和受民众欢迎程度,社会中也缺乏度量和体现民众意愿的各种指标。但这时 PBC 模型仍然可以使用一些间接指标,如政治领袖和执政党派的轮换频率(政府成员的频繁轮换一般是政府陷入困境的信号,也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同公众关系紧张的一种标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急剧变化,名义收入水平(名义工资水平)的政策性调整,转移支出和税率降低等,仍然可以使用 PBC 理论的一些基本结论。

PBC 模型中政策动态非相容性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因。一是经济中具有大量的相异个体,他们的投票评价函数可能具有很大区别,并且个体选择具有相当的外部

性,这样无法形成集中的资源配置趋势,导致政府选择同个体选择出现差异,导致政策的非相容;二是政府和个体具有不同的效用目标,政府可能具有一定的“自私”行为,政府极大化投票率同社会福利极大化存在差距,也可能导致非相容性的出现。三是政策选择具有较长的时域,这时政策相容性的允诺约束降低,增加了个体和政府相机选择的机会,并减少了“反悔”带来的社会成本。

PBC模型和PBC形成主要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对现实经济运行进行有效灵敏的干预,作为政策工具的非力普斯曲线机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各种政策工具作用依赖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因此PBC同经济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同时需要注意,由于长期非力普斯曲线关系十分微弱,PBC理论对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作用不大,PBC更适于短期波动分析。

我国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当中也存在许多PBC成分(张守一,1995)。产生这些PBC成分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的换届选举、重要的政治会议、重要的国内和国际事件以及周期性的经济计划等。总体上看,我国稳定的政治和体制制度为减少PBC成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导致政策动态非相容的一些因素显著少于其他国家,动态相容的经济政策和计划为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PBC成分的原因,均同经济的短期调整行为有关,政策缺乏长期动态稳定性。PBC是在寻求实现一定的社会或经济目标,在较强的单向调整过程中出现的。这时所有名义政策工具上的虚拟反应,例如大规模的货币发行和名义收入增加,虽然短期内能够增加产出和消费,但最终一定要在通货膨胀上体现出来;较大规模的国债和政府支出,一定会导致膨胀的财政赤字,最终通过转移债务和税收增加,形成对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挤出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需求萎

缩。因此PBC理论表明,目标性调控政策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均衡之间的冲突,必将导致调控目标实现之后的政策作用反弹,这正是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可能风险来源,在有效扩张内需和减轻通货紧缩时必须予以注意。

任何社会的政府部门和私人个体,均在意愿和要求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异,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完全在瓦尔拉斯状态下进行的。政府即使为了极大化社会福利水平,也需要对私人个体的行为反应进行对策;私人个体即使完全相信政府允诺的目标和政策,那么也会将经济现实、个人福利和未来社会状况同政府能力和政策联系起来。只要政府和个体之间的联系存在,只要经济政策有效,那么经济运行中的PBC成分就会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蔽地存在,因此PBC理论需要在更为广泛的制度框架和经济结构下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参考文献:

1. 张守一:《我国经济周期的特殊原因与波动格局分析》,载《经济研究》,1995(4)。
2. Barro, R.J., and Gordon, D.B., 1983.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 101-121.
3. Kydland, F.E., and Prescott, E.C.,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3): 473-491.
4. Mueller, J., 1970.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18-34.
5. Nordhaus, W.D., 1975.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s of Economic Studies*, 42: 169-190.
6. Stigler, G.J., 1973.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155-160.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 N)

(上接第60页)抢占国际教育市场份额,从而逐步减少贸易逆差,扭转自己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被动局面。

注释:

1994年的12个欧盟成员国记作一个成员。

如,在遵从CPC分类的大前提下,有的成员还在承诺表中使用了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和国家教育(national education)等概念。

关于4种方式的举例和评价,参见Pierre Sauvé, 2002: Trade, Education, and the GATS: What's In, What's Out, What's All the Fuss abou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OECD/US Forum on Trade in Educational Services, pp. 7. ;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2002: 2002 Annual Report, available at www.usitc.gov; OECD/CERI, 2002: Indicators on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Trade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p. 11. ; www.educate.org/certification.html;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中文版,229、23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巴吉拉斯·拉尔·达斯:《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中文版,96、9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一是因为这些成员面临更大的开放教育市场的谈判压力,二是他们希望吸引外国的教育投资。另外,他们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好处的认识有所增强。

OECD/CERI, 2002: Current Commitments Under the GATS in Educational Services, background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2002 OECD/US Forum on Trade in Educational Services in Washington, DC, U.S.A.,

pp. 2~9.

详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另外,水平承诺还对自然人流动作了承诺限制,此处没有载明。

它们是:中国、捷克、立陶宛、约旦、莱索托、马尔代夫和塞拉利昂。

贸易额的统计主要基于高等教育留学生(境外消费)的所缴学费,澳大利亚的统计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和语言培训服务。资料来源:OECD Statistic on Trade in Services and IMF: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尔豪、敬雪:《留学教育:“走出去”与“请进来”》,载《法制日报》,2002-08-10。

⑩章新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高等教育》,载《中国高等教育》,2002(2)。

⑪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000: Higher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CSS/W/23; Communication from Japan, 2002: Negotiating Proposal on Education Services, S/CSS/W/137; Communication from Australia, 2001: Negotiating Proposal on Education Services, S/CSS/W/110; Communication from New Zealand, 2001: Negotiating Proposal on Education Services, S/CSS/W/93. Available at www.docsonline.wto.org.

⑫参见武汉大学教务部2002年受教育部委托调研并向其递交的咨询报告:《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法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规定的学术调研报告》。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J)